



语言符号学译丛

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

——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

【荷】丁达·格雷 / 著 贾洪伟 / 译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博睿学术出版社



南开大学出版社



语言符号学译丛

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

——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

[荷]丁达·格雷 著

贾洪伟 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 /
(荷) 丁达·格雷著；贾洪伟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3

(语言符号学译丛)

ISBN 978-7-310-05762-7

I. ①符… II. ①丁… ②贾…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285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运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2 插页 278 千字

定价：5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Dinda L. Gorlée

Amsterdam-Atlanta, GA 1994

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by Dinda L.

Gorlée © 1994 by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incorporates the imprints Brill | Nijhoff, Hotei and Global Oriental. The Chinese version of 《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 is published with the arrangement of Brill.

英文原版：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地址：荷兰莱顿

网址：<http://www.brillchina.cn>

版权所有 翻译必究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2-2019-8 号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 (王铭玉)	9
凡例与说明	13
致谢	15
1. 绪言	17
引言	17
符号学与翻译研究之一般性	19
符号学与翻译研究之艺术状态	25
皮尔士与翻译研究	35
2. 皮尔士符号学原理	40
引言	40
语言符号学与符号学	41
皮尔士生平与著述	46
皮尔士的思想	48
三大范畴论	50
推理与逻辑	53
皮尔士之实效主义	59
符号	62
对象	66
解释项	70
符指过程	76
皮尔士之三分法与符号分类	77
3. 翻译、游戏符号学与决策	83
引言	83

2 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

作为符号阐释之翻译	83
符指过程与游戏论	86
国际象棋与智力拼图	90
翻译乃游戏	93
决策树与联想网络	98
结语	102
4. 维特根斯坦、翻译与符号学	103
引言	103
图像论与翻译	104
从像似符到符指过程	107
语言游戏	114
文化	116
基础 (Ground)	118
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	119
翻译的语言游戏	122
作为符指过程的翻译	124
翻译论：维特根斯坦与皮尔士	128
5. 皮尔士与翻译问题：灵魂与躯体	133
引言	133
作为译者的皮尔士	133
可译性	136
作为符指过程的翻译	140
投胎转世	147
作为运动的翻译	149
结语	153
6. 同异论：本雅明与皮尔士	155
引言	155
本雅明之语言哲学	157
本雅明之翻译观	158
理论对象：本雅明与皮尔士	159

翻译作为文本分化	163
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	166
结语	168
7. 继皮尔士及雅可布森之后的翻译	170
引言	170
雅可布森与皮尔士	172
语言与意义	175
翻译论	177
三类符号与翻译	181
语内翻译	184
语际翻译	186
符际翻译	188
信息与翻译之进化论观	192
翻译之三元本质	194
8. 等值、翻译与译者之角色	196
引言	196
等值	197
品性等值	201
指称等值	203
广度、深度与信息	206
意义等值	208
翻译过程	210
一级、二级和三级逻辑解释项	215
译者的角色	217
结语	224
9. 等价：契约符指过程与翻译	226
引言	226
契约	227
作为言语行为的契约	236
从命题到断言	238

4 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

契约式符指过程	242
翻译符指过程中的发话人与阐释者	245
翻译作为契约符指过程	248
结语	253
10. 结论与建议	255
引言	255
符号翻译	257
结语	263
译后记	264
附录 1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	267
引言	267
何谓翻译符号学?	272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基础	273
翻译与符号学的联姻	278
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280
翻译符号学的当前要务	281
附录 2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	285
引言	285
翻译概念衍化与学科发展观	286
翻译符号学的界定与研究对象	292
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定位	296
结语	298

译者的话

世界著名符号学家、翻译学家丁达·格雷(Dinda L. Gorlée, 1943—)系现代国际学界首位以皮尔士符号学视角探讨翻译问题的学者,曾于1990年在“意大利安达卢西亚符号学会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翻译即叛逆:论翻译符号学》(*Traduttore Traditore: Semiotica de la Traducción*),旗帜鲜明地提出“翻译符号学”(Semiotica de la Traducción)这一概念,尽管后来改称为“符号翻译学”,但对符号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二者的结合不断走向现代学科化。

笔者拟以格雷女士个人主页(<http://gorlee.home.xs4all.nl/index.html>, 2015-8-8)所列信息为基础,从求学、教学、科研、学术成就与影响等角度,扼要地介绍她研究和推动翻译与符号学联姻的历史进程,总结其学术成就,说明笔者之所以译介格雷专著的因由。进而,笔者拟以译著信息为据,归纳原著存在的学术问题和规范问题。

求学

有关格雷女士出生信息及其少年受教的经历,笔者虽遍查网络,但终无所获,只能依靠格雷主页及相关论文中的零星信息,还原其求学经历。

格雷女士于1961年至1968年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学习西班牙语、荷兰语、英语、葡萄牙语、瑞典语等语言及相关文化,修习普通语言学、比较文学、法国法等科目,于1964年获得该校西班牙语语言文学(Spanish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学士学位,于1965年和1968年分别以英语论文《论莎翁〈维洛那二绅士〉及〈第十二夜〉中之田园传统渊源:以蒙特马约尔之〈戴安娜〉为证》(“Shakespeare's 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and his 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 and their Indebtedness to Pastoral Tradition, as Exemplified in Montemayor's Diana”)和西班牙语论文《论阿索林小说之决斗结构及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Aspectos de la estructura de Doña Inés, novela de Azorín, a la luz del problema del tiempo en la novelística moderna”)获得西班牙、英国和葡萄牙语言文学(Spanish, English and Portugu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双硕士学位。

1977年至1979年,格雷赴阿姆斯特丹大学修习法律,于1981年获得荷兰语和西班牙语宣誓法律笔译与法庭口译员证书(Sworn Legal Translator and Court Interpreter, Dutch, Spanish);1983年至1984年赴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修习挪威语言学,后回到阿姆斯特丹大学注册翻译研究方向博士项目,因选题有违师旨,故独自笔耕,在博士论文中阐述皮尔士符号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得到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的支持和鼓励,于1993年完成博士论文《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Semiotics and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通过答辩,获得该校翻译研究与符号学博士学位,又于1999年获得法律笔译与法庭口译员基础学院法律英语证书。多年的苦读和游学积淀,为格雷打开了语言学习的大门,前后共学习和使用13种语言,接触并研究符号学、翻译学、语言学、法学、神话、文本学等,为格雷日后在教学和科研生活中取得硕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学与职业经历

格雷取得第一个硕士学位后,并未走向高校教学岗位,而是到格罗宁根大学图书馆做馆员(1967—1968年),后任西班牙语语言学与翻译项目助教(1968—1970年),转到国家西班牙语中级教师考委会(State Examiners Board for Secondary Teachers of Spanish)负责语言学与翻译部分(1970—1983年),同时于1978—1983年兼任格罗宁根大学西班牙语助教。1983—1991年,格雷赴卑尔根大学任西班牙语语言学与哲学高级助教,专攻维特根斯坦理论,期间于1988—1992年赴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Bloomington)分校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中心任研究

助理员、1988—1991 年赴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分校任皮尔士版本研究项目访问学者。

1992 年,格雷赴阿姆斯特丹大学访学于翻译研究项目,同年赴圣保罗大学访学于符号学、翻译研究和法律研究项目。1992—1993 年,她升任格罗宁根大学翻译研究方向的兼任教授;1992—2001 年,她任法律翻译与法庭口译基础学院法律翻译项目主任,期间重返圣保罗大学访学(1996 年),赴瓦加杜古大学(与荷兰外交部和罗格宁根大学合作大学)任翻译研究项目访问教授(1996 年、1998 年),赴维亚纳大学任翻译研究项目访问教授(1996 年),赴因斯布鲁克大学任翻译研究项目访问教授(1997—2000 年);2001 年至 2005 年任赫尔辛基大学翻译研究与符号学项目访问教授兼任项目主任,2004 年至今任卑尔根大学维特根斯坦档案中心(Wittgenstein Archives)研究助理,2009 年至今任美国休斯敦大学维多利亚分校《美国书评》(*American Book Review*)副主编,2014 年至今任《北欧维特根斯坦研究》书系顾问(Member Advisory Board of Nordic Wittgenstein Society in Book Series)。此外,1997—2012 年,格雷任法律翻译机构(海牙)各语种执行主任。

从简单的职业履历可见,格雷好似繁忙的打工仔,频繁地穿梭于各类公交系统之间,一会儿挪威,一会儿罗马,一会儿奥地利,一会儿美国,频繁地转换着跑道,不但博学广闻,增长见识,还可积累深厚的各种语言文化的知识,这也是为何格雷的学术著述内容如此驳杂,同时为何她没能沿着一条路线走下去,最终形成一道具有独特风格的风景线(即没有形成系统的翻译符号学、符号学翻译研究、符号翻译学理论体系),因为她无暇沿着一条路走下去。

科研与成就

多年的游学经历、频繁往返于各国高等学府、长期捧读古今文献,为她学习各国语言奠定了环境基础,她先后掌握了荷兰语(母语)、古拉丁语、古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葡萄牙语、挪威语、丹麦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芬兰语,便于她担当多语口笔译实

务与理论、比较法学、对比法律文本等研究任务，同时涉及普通与应用符号学、文本符号学、语言—音乐符指间性、语言与翻译、音响翻译、神话等研究领域。

自1977年，格雷翻译了十余项学术作品，涉及文学、修辞、新闻、符号学等领域西班牙语、荷兰语、英语、挪威语、法语几个语种之间的互动，有母语（荷兰语）译为外语、外语译为母语、外语译为外语三类。

自1981年，她共写作书评、报道、札记、访谈类文章近80篇，涉及符号学、翻译、哲学、法律实务翻译、文学翻译、口笔译理论与实务、神学与哲学、法律符号学（Forensic Semiotics）等，均以符号学内容为主导。

自1986年，她共写作期刊论文和论文集收录文章70余篇，虽然涉及符号学、翻译学、游戏符号学与译论、符号与偶然性、符指过程、维特根斯坦符号论、维特根斯坦翻译论、维特根斯坦与皮尔士之语言游戏论、雅可布森译论观、皮尔士之文本符号观、歌剧翻译、古希腊经典翻译、符号逻辑推理、符指间性、翻译本质（镜式本质）、翻译黑匣、元创作、歌德译注等众多领域与层面，但均以符号学理论为骨架，以符号转换与流动为实质，从而奠定了她在国际符号学界的地位。

自1994年，她出版专著4部，基于博士论文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Semiotics and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Leiden & Boston: Brill/Rodopi, 1994）、《论符号转换：文本与符号翻译探》（“On Translating Signs: Exploring Text and Semio-Translation”，Leiden & Boston: Brill/Rodopi, 2004）、《翻译中的维特根斯坦：符号学之探》（“Wittgenstein in Translation: Exploring Semiotic Signatures”，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2012），以及2016年新出版的《从翻译到译介：符指间性的镜式本质论》（*From Translation to Transduction: The Glassy Essence of Intersemiosis*, Tartu: University of Tartu Press, 2015），编著2部：《歌曲与意义：音响翻译之利弊论》（*Song and Significance: Virtues and Vices of Vocal Translation*, Leiden &

Boston: Brille/Rodopi, 2005) 和《符号学: 国际符号学会会刊专刊“符号翻译之重要符号论”》(*Vital Signs of Semio-Translation [Special Issue] Semiot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163-1/4, 2007), 主编挪威符号学研究会会刊 *Livstegn* (1986—1991 年)。

如上所述, 格雷的学术成就大致可归纳为如下 6 点: (1) 率先将皮尔士的符号三元观融入翻译过程研究, 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和剖析符号转换过程中涉及的现象和规律; (2) 率先比较维特根斯坦与皮尔士之间的语言游戏观差异及其与翻译之关联; (3) 从符号学角度, 考察歌德《东西方合集》译介过程、内容构成、译介因由等, 剖析歌德翻译实务与翻译理论主张之关联; (4) 从符号学视角, 审视心理学中的翻译黑匣现象, 从二者结合的角度探讨翻译之镜式特质; (5) 率先从符号学和翻译学联姻角度, 探讨歌剧、歌曲、音乐、法律文本中的符号转换现象, 总结文字符号文本转换为音声效综合的符号文本所出现的独特规律; (6) 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古希腊经典的翻译问题, 从共时与历时、同化与异化、时间与空间等角度探讨跨越时空文本的间隙弥合方式和途径。

在西比奥克的支持和洛特曼的鼓励下, 格雷独辟蹊径, 将皮尔士的符号学三元观融入翻译研究, 与洛特曼弟子特洛普谱写学术友谊, 共探符号学与翻译学联谊之秘, 多年来往返于挪威、意大利、美国、芬兰等国高校和哲学与符号学研究机构, 宣讲学术文章, 执编符号学刊物, 审校各国符号学文章, 积极地推动符号学跨学科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皮尔士符号学乃至普通符号学与翻译学联姻的跨学科事业, 这也是笔者选择翻译这部著作, 同时编译格雷符号学与翻译学联姻论文选集的根本动因所在, 通过引进格雷有关二者联姻的相关思考, 促进国内学者反思学科历史与现状, 思考二者结合的相关问题, 特别是如何做好二者结合的本土化问题, 为翻译符号学这一新学科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奠定一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存在的学术问题

此处所谓学术问题, 是笔者在翻译过程 (实质上也是与作者的一

种对话过程)中针对特定的问题所引发的思考,其实也未必是真的学术问题,也未必就一定是绝对正确,或比格雷的观点高明多少。之所以将其中几条录入于此,权当是与读者诸君互通观点,以便促进学术进步。

(1)从皮尔士符号学的发展史以及翻译与符号学联姻之史实可见,雅可布森受到皮尔士符号学三元范畴影响,将皮尔士符号学发展到侧重散文诗歌言语艺术之广义的语言学范畴,涉及言语符号互动与转换的翻译范畴。格雷将雅可布森受皮尔士影响划分译域的史实弃之不顾,以逆向思维方式将雅氏三大译域视为固有之存在,拿皮尔士三大本体范畴(三元观)为参考,对三大译域加以阐发和提炼(参见Gorlée, 1994: 148),与史实和科学研究方法论之历史客观性、逻辑性和因果律颇多出入。

(2)从宏观角度看,这部著作虽然为作者的博士论文,但是由先前发表的论文或经重组、或经删减、或经提炼而成,故文本结构失衡明显,不但没有平衡好科学文本之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就连各章之间的均衡性也难以保持,如全书各章均设有“结语”一节,唯独第7章无“结语”断后。

(3)从微观角度看,该著有关契约符指与翻译符指之类比,在一定程度上是失当的,因为契约关系需要双方基于共同意愿形成约束双方义务的文本,在本质上双方的意愿未表达前属于无形符号,表达后属于有形符号,在经历无形到有形的转换后,二者发生汇聚,形成文本,这里的当事双方与翻译符指过程中的作者与译者不能等同,翻译符指过程的生成文本不同于契约文本,因为前者有固定底本,后者无固定底本。仅从这两点上看,二者的类比确实存在本质上的问题。

类似的所谓学术问题还有一些,因为篇幅有限,同时也无需重复正文内容,诸君可在正文脚注中找到相关论述。

存在的规范问题

可能是因为由不同年代和不同刊物发表的文章组合而成,也可能是因为编辑的疏忽,原著中存在较多学术规范问题,现将其分为6类,

以典型性实例加以佐证。

(1) 原著出现文章名大小写不一致的现象,如原著第 115 页之“*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与第 144 页脚注中的“*On the Mimetic Faculty*”。按照国际学术规范,英文文章名只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即可,若在参考文献中,用引号标识,可见后者的大小写不符合规范;同一文章名称,在文内脚注与文后参考文献中的大小写也不一致,如原著第 157 页脚注 12 中之“*On Jakobson on Translation*”与第 248 页参考文献中之“*On Jakobson on translation*”。按照有关文章名称大小写规范要求,除了首个单词首字母大写外,只有人名、地名等专有名字的首字母大写,这里的同一文章名,“*translation*”的写法却不同。类此事例书中尚有几处,译著皆一一改正统一之。

(2) 在符号学基础理论与术语阐发内容层面,有关一级符号范畴、二级符号范畴、三级符号范畴与直接对象、动态对象的内容,多次重复;有关像似符、指示符、象征符及其相关的符号关系,多次重复,等等。这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和专著出版的规范要求。

(3) 作者在引用有关论据信息时,出现同一信息出处不一致的现象,这与国家学术规范的要求不一致。除非是同一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否则均以初版为准,若有特殊原因需要使用两个版本的,须同时标出两个版本的相关信息。但原著(译著也保持了这种状态)在有关雅可布森“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的相关内容中,引文一会儿用 1971 年版本(如原著第 156 页脚注 11),一会儿又同时使用两个版本(如原著第 156—157 页有关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的引文)。

(4) 原著参考文献出现信息不全的现象。按照国际学术规范要求,析出文献须交代作者、文献名、编者、文集名、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范围等信息,可原著第 248 页出现了这样一则文献:Sturrock, John (1991). On Jakobson on translation. Sebeok and Umiker-Sebeok (eds.) 1991: 307-321. 其中文集名称信息缺失,给相关读者查找文献带来不可避免的困难。

(5) 原著正文夹注信息不符合学术规范。如根据全书有关《皮尔

士文集》(*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相关标注,均为(CP: 5. 103, 1903),但在第159页倒数第11行的行间夹注则是(CP5. 103, 1903),与全书大部分标注不符;此外,正文夹注中有关出版年的标识也不一致,如第159页的(CP: 2. 297, c. 1895)、(CP: 2. 249, 1903)与第160页的(CP: 2. 228, 1897)、(MS 599: 43, c. 1902),同样是《皮尔士文集》(CP)信息标注,同样是19世纪末期,为何一个标识了表示 century 的 c., 而一个没有呢?进而,同样是20世纪初年,为何《皮尔士文集》(CP)的出版年没有标识,而《皮尔士手稿》(MS)有标识呢?这前后两种情况是否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呢?是作者有意为之,想表达特定的意味,还是出版过程中编审程序不够严谨呢?

(6) 原著第167页倒数第8行夹注(CP1. 549)不符合国际学术中夹注的书写规范,就是与书内其他同来源的夹注书写模式(如同页同段正数第6行之(CP: 1. 549)也不尽相同。此外,该页源自《皮尔士文集》(CP)和《皮尔士文集: 编年版》(W)的数据混在一起,如(CP: 1. 549; W 2: 51, 1867),作者在书前没有明确交代,数据中的年代信息为相关言论的写作年代,而不是出版年代,容易让读者误会,甚至混淆。

相对而言,符号学与翻译联姻或曰翻译符号学尚属新兴交叉学科,本译著系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一部开创性较强的作品。由于笔者自身的功底不够深厚、外文理解不够充分、中文表达不够精确等原因,缺点和不足在所难免,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适用于符号学和翻译研究方向的教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可作为其他符号学和翻译爱好者的业余读物。

贾洪伟

2016年夏修订于京西精致阁